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近代卷

杨联芬 主编

中國散文通史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ARTLIN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國散文通史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近代卷

杨联芬 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通史. 近代卷 / 杨联芬主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336-7193-8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散文—文学史—中国—
近代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3877号

书名: 中国散文通史·近代卷

主编: 杨联芬

出版人: 朱智润 策划统筹: 张丹飞 张利 责任编辑: 王骏
版式设计: 朱锦 装帧设计: 张鑫坤 技术编辑: 王琳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63683010, 63683011, 63683015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51)6585948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20×1010 1/16 印张: 18 字数: 270千字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7193-8 本卷定价: 112.00元(全套定价: 149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忧国感时:经世之文	005
第一节 龚自珍:伤时骂坐,经世之魂	007
第二节 魏源:学务有用,不托空谈	018
第三节 包世臣:审时度势,深切著明	027
第四节 汤鹏:意气蹈厉,震烁奇特	033
第二章 开眼世界:散文新体	039
第一节 冯桂芬:抗论当世,消弭时灾	039
第二节 王韬:报章文体的开创者	047
第三节 郑观应、马建忠:时务切要之言	057
第三章 桐城派的中兴	067
第一节 嘉道之际:桐城古文薪火相承	067
第二节 湘乡之兴:曾国藩	080
第三节 曾门四弟子:桐城湘乡派中坚	088
第四节 其他作家:吴敏树	110
第四章 古文的余响	127
第一节 沈曾植、马其昶	127
第二节 晚期桐城派:姚氏兄弟	137
第三节 林纾与严复	148
第四节 陈三立、陈衍与唐才常	165

第五章 别立新宗,百家杂说	175
第一节 章炳麟的魏晋文	175
第二节 王闿运、刘师培等的骈文	186
第三节 俞樾与八股时文	196
第四节 郭嵩焘、李慈铭的日记杂说	204
第五节 章士钊的政论文	215
第六章 维新派与新文体	223
第一节 康有为:文章非末事,中有济世策	224
第二节 谭嗣同:文章无古今,功夫在熔铸	238
第三节 梁启超:养淋漓之元气,开文章之新体	247
第七章 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散文	259
第一节 革命派与宣传文	260
第二节 革命派的女权言说	267
参考文献	278
后 记	284

绪 论

“五四”以来的文学,常被指其与社会变革联系太紧,因而削弱了其文学性。但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目的论倾向,早在 19 世纪中后期文人散文“经世致用”之风衍生时,已见端倪。

本来,关怀现实、兼善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传统中与“内圣”相平行的另一半(所谓“外王”)。然有清三百年,伴随康乾盛世而来的文化绥靖政策及文字狱,使清代士大夫匡济天下的思想激情与创造活力,被成功转移到治史、考据等纯学术领域,清代学术遂呈一时之盛况,而知识分子也逐渐安于退守书斋、皓首穷经的学者生活。

这个状况的打破,自龚自珍、魏源始。而龚自珍、魏源的出现,时势使然。

嘉、道之际,中国乱象丛生,外忧不断;道、咸以降,更是内乱频仍,国势危殆。“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危忧,恒相与指画天地,规天下大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龚自珍、魏源力倡今文经学,试图扭转“万马齐喑”的学界风气。他们借《春秋》公羊说,“讥切时政,诋排专制”。龚自珍竭力为改革正名,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易移”(《上大学士书》,《定庵文集补编》);晚清倡导新学的启蒙论者,大都受其影响。同期包世臣、汤鹏等,也排斥空疏之言,关注国计民生;他们的散文,与龚、魏文章一起,使一种经世致用的为文之风,吹进学界文坛。正如梁启超所言:“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源,归咎于

学非所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因而,走出书斋,直面现实,成为近代散文创作的主要特征。

继龚、魏之后,在散文写作上继续追求经世之道,而在体式上更加不拘一格的,有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冯桂芬可谓晚清奇人,他精熟汉代经学、宋明理学和小学等正统学术,同时却对经济杂学及社会实践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博览群书,通晓“西人格致之学”(如天文、地理、水利、军事等),曾经在测绘、计量、漕运等方面做过实际有益的工作。他的“杂家”学问和实践能力,对社会变革的热切关注,以及对政治弊病的深刻针砭,都体现在其著名的政论文集《校邠庐抗议》中。冯桂芬生前不允刊行此书,他辞世后《校邠庐抗议》才得以刊行,而其影响却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持续到戊戌变法之际。他的“制洋器”、“采西学”主张,相对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进了一步;他关于吏制、科举及教育、赋税、水利、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建言,也极大地启迪了时人。王韬曾受雇于英国传教士达十年之久,游历过英、法、苏格兰及日本,既有英国治下香港生活的经验,又是报人,故对天下大势、世事变迁,往往独具只眼。他将其所见所感,“达之于日报”(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后辑为《弢园文录外编》凡8册共12卷。《弢园文录外编》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历史知识,每有深刻新鲜的见解;而它通俗晓畅的文风,以及对文章的独特见解,不啻贡献了一种新的散文体式 and 新的散文观念——“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使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王韬的游记散文,更是别开生面,向封闭的中国读者,展示西方的政治、文化、风习。马建忠出生于传教士之家,又经常襄助朝官,出入于外交场合,他的散文,往往提供一个更具体的经济制度层面的“富国”“富民”之方。他对西方商业和税收制度的推介,与郑观应《盛世危言》对商业的推崇,都成为当时新进而有冲击力的言论,动摇着传统中国的价值观。郑观应认为洋务运动不能仅仅着眼“西技”,更要引进“西体”的意见,更是率先触及了政治体制问题,振聋发聩。这些以社会实用为目的的散文创作,因突破古文局限,而对康有为、梁启超等有直接影响。

此期间,继王、魏传统并对桐城派散文有所发展的,是咸丰、同治年

间曾国藩一派所带来的古文“中兴”。

桐城派散文,形成于康、乾盛世,产生了方苞、姚鼐等大家,是清代文学成就最大的门类之一。但桐城古文在嘉、道以后逐渐衰落,“其敝至于浅弱不振,为有识者所讥”(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到道光末年,桐城古文在曾国藩的影响下,竟又梅开二度,重振芳华。曾国藩既推崇姚鼐,也推崇方苞,却并不死守桐城家法;他在延续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经济”一条,强调对现实的关注;他的文章,也以经世为要,“使古文有了致用之道”(季镇淮《近代散文的发展》,《来之文录续编》),桐城古文遂重新焕发魅力。曾国藩“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续古文辞类纂》卷十一《与吴南屏与篠岑论文派书》),在散文的范畴和理论上,对桐城古文都有所发展;而其本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善于招贤纳士,终至在其门下形成桐城之“湘乡派”,张裕钊、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等杰出散文家均为其门人。这一时期,在古文创作上颇有成就的,还有一位特立独行的散文家吴敏树,吴文章漂亮,接近桐城派,却坚辞入曾幕府,并在身后一直寂寞。

清末散文大家,还有集清学之大成的沈增植,桐城古文传承者姚氏兄弟、马其昶、林纾,特立独行的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陈衍,以及以先秦诸子文体翻译西方学术思想的严复。此外,推崇魏晋、鄙薄唐宋的章炳麟,以骈体文名世的王闿运、刘师培,以及以著八股时文见称的俞樾,也都各以其飞扬的文采呈现个性。郭嵩焘记载西方见闻的《使西日记》,与李慈铭良莠杂陈的《越缦堂日记》,则折射出晚清散文的丰富面向。

19世纪末,伴随中国政治军事的严重危机,思想界维新变法思潮兴起,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脱颖而出。“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维新派所倡导的新文体,超越了冯桂芬、王韬等的“中国中心”意识,大张旗鼓倡导学习西方,他们的文章,成为近代思想启蒙中最富现代性的文本。康有为的大量奏议、上书,列举弊端,倡言政体改革,皆慷慨陈词,逻辑谨严。如果说康有为的文章,在晚清上层影响甚大,那么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

超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大量散文,讨论国情民心,批判专制文化,解剖国民心理,其饱满的激情,酣畅的语言,极富感染力。其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风格,则影响了年轻的一代人——这些人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20世纪初,革命派开始成长。他们的文章,尽管完全抛开古文传统,然从另一方面讲,则无疑将嘉道以来逐渐形成的散文“经世致用”之道,推到了极端,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更加直接,语言艺术的讲究,也退而忽略不计。为启迪和动员社会更广泛的阶层,白话文也随白话报刊而开始风行。

一部近代散文史,大致呈现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知识分子思索中国前途时,由“开放”到“西化”,由“改良”到“革命”,由“器物”到“精神”的现代性追求的完整轨迹。同时,散文的观念、语言和形式,也随之逐步变化。其中所包含的文学观念的检讨与转变,散文文体的发展与局限,也延续到下一个阶段即“五四”及其后的现代文学中。

第一章 忧国感时：经世之文

清嘉庆、道光年间，康乾盛世已经结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而历来肩荷“匡济天下”重任的中国士子阶层，却处于“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①的状态。古文经学的末流已经完全抛弃了对儒家经典中大问题的思考，而忙于考据小学，“但求名物，不论圣道”^②，与社会政治严重脱离。众多的学子，墨守程朱，却又仅仅将其当做官方科举考试的敲门砖，“其沾沾而谈程朱者，不为势利之徒，即为陋儒”^③。因此，一部分士人率先觉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④，力图重新整合“学”与“治”，重振儒家传统中的“外王”之议，挽狂澜于既倒。

同时，在汉学内部，思想体系也在发生动摇。清代汉学家的出色工作反而史无前例地威胁到了古文经书的正统地位。比如阎若璩对《尚书》所作的词源学分析，使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说法在几百年中被当做定论（此说直到近年郭店竹简的出土才遭到有力的质疑）。随着古文经典的地位遭到威胁，今文经学从汉末沉寂之后第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庄存与以《春秋正辞》第一个对古文经学发难，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首倡者。此后，庄存与传刘逢禄，刘逢禄传魏源、龚自珍，再经廖平传康有为、梁启超，

① 魏源：《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6～37 页。

② 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集》第一集卷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③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781 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据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影印。

今文经学逐渐成为清代末期的显学。

而“(仁宗)尽失两朝(雍正、乾隆)钳制之意,历二十年之久,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①。清朝末期,积威日弛,其控制力的减弱,也为学术思想的松动变革提供了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汤鹏等人乘时而起,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②,并以讲“改制”、倡“变异”为特点的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相结合,接续儒家思想中的“经世”传统,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他们力图以此来扭转学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重建西汉今文学家所憧憬的太平之世。

“经世致用”指的是“学问所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进其幸福,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龚魏等人以今文经学为思想资源,以“经世致用”为指导原则,创作出了一批将经术、政事、文章结合在一起的“经世文”。“经世文”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桐城义法的束缚,带有鲜明的近代色彩。

①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4~615页。

② 龚自珍:《与江慎修书》第六,《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一节 龚自珍：伤时骂坐，经世之魂

龚自珍(1792—1841)，字璚人，一名易简，字伯定，更名巩祚，号定庵，又号羽琤山民，浙江仁和人。“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魏源《定庵文录叙》)，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一生诗文甚丰，后人辑有《龚自珍全集》传世。

龚自珍出生于三代仕宦的书香门第。祖父龚昶身著有《吟臞山房诗》。父亲龚丽正，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亲段驯，是清代大学者段玉裁之女，善诗词，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十二岁，从学于外祖父段玉裁，接受考据学训练。然而，世事危殆，龚自珍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二十八岁时，随刘逢禄习今文经学，思想、学术轨迹发生巨变，“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今文经学的学习，为他以后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成长为开一代风气的思想家和散文家奠定了基础。

龚自珍为文，能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的社会环境下，以经术作政论，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思考。他主张作文也要“经世致用”，并用这种思想来对抗当时严重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他年轻时撰写的《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就是“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代表：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

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非由他，由于无以作朝廷之气故也。

何以作之气？曰：以教之耻为先。《礼·中庸》篇曰：“敬大臣则不眩”。郭隗说燕王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伯者与臣处，亡者与役处。凭几其杖，倾盼指使，则徒隶之人至。恣睢奋击，呶籍叱咄，则厮役之人至。”贾谊谏汉文帝曰：“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凡兹三训，炳若日星，皆圣哲之危言，古今之至诚也。（《明良论·二》）

《明良论》是龚自珍于1813年前后写成的一组政论文，共有四篇。

1813年，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发生民变，皇室危殆。嘉庆皇帝震怒，连发谕旨骂朝臣“寡廉鲜耻”，推卸责任。《明良论·二》针对的就是这一事件。龚自珍认为“国之大耻”源于“士不知耻”，而“士不知耻”源于没有“教之耻”，没有“教之耻”是因为君主不能“敬大臣”。作者开篇就直奔主题，层层剖析出问题的根本所在，气势逼人。龚自珍指出，君不敬臣，则臣权不重，臣节不威，而臣“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弊”（《明良论·四》）：

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去，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岂真敬畏哉？问以大臣应如是乎？则其可耻之言曰：我辈只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务车马、捷给者，不甚读书，曰：我早晚值公所，已贤矣，已劳矣。作书、赋诗者，稍读书，莫知大义，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志愿毕矣。且愿其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鸱燕逝而已，伏楦下求俱压焉者鲜矣。（《明良论·二》）

因此，龚自珍认为只有回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的君臣关系，

才可能养臣气、养臣节,实现君主所希望的“臣报君以节”的理想状态,才能真正做到不辱国家、不辱社稷。同时,龚自珍认为官场“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的升迁制度,也造成了晚清官僚体制因循尸玩的风气:

今之士进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计之,以三十为断。翰林至荣之选也,然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学士。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急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夫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虽有耆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进;然而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蒞,因退蒞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僂然终日,不肯自请去。或有故而去矣,而英奇未尽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明良论·三》)

朝廷中为宰辅、为一品大臣的都是齿发已老、精神已惫的人,因恋其籍,或顾其子孙而审顾、退蒞、尸玩,故其然也。段玉裁这样评价这四篇文章:“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文章探讨的是实际政治中的问题,与嘉、道以来空无一物的文章迥然不同。

龚自珍在对现实积弊进行分析、抨击的基础上,以“今文经学”为旗帜,提出了“改革”、“更法”的主张:“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同时,他又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对具体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在《西域置行省议》中,龚自珍主张移民到新疆,以巩固西部的边防,开发西部经济。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龚自珍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他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林则徐在回信中评论说:“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

龚自珍的政论文常常气势恢宏,这源于他对当时社会危机的深刻体

会与力挽危局的急迫心情。他从《公羊传》“三世三统”的历史哲学体系出发,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衰世”——“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己卯自春徂夏》),“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尊隐》),“履霜之屨,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痼癘之疾,殆于痼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国内的矛盾日益尖锐,“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同时,列强的侵略更是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正因身处这样的时代,作为具有“兼济天下”理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龚自珍才能在大厦将倾的局势下,以急迫的心情,写出这些现实性强且气势恢宏的文章:

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疑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中书仕内阁,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见所闻,胸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安之,而中书一人,胸弗谓是;大庭广众,苟且安之,梦觉独居,胸弗谓是;入东华门,坐值房,昏然安之,步出东华门,神明湛然,胸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疑中书有痼疾,弗辩也,然胸弗谓是。如衔鱼乙以为茹,如藉猥栗以为坐,细者五十余条,大者六事,兹条上六事,愿中堂淬砺聪明,焕发神采,赐毕观览。(《上大学士书》)

文章从辨析人的思想认识入手,连用五个“胸弗谓是”,表达了作者对当时官僚体制昏庸腐朽与因循守旧的控诉。

龚自珍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在写作政论文时,针对现实问题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1〕}式,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的气势,以及明中叶以来

的个性解放思潮,针对桐城派散文,提出写文章不应该局限于人为的义法与家数,应该“率是以言,续是以言,勤勤恳恳,以毕所欲言,其胸臆涤除余事之甘苦与其名,而专一以言”(《绩溪胡户部文集叙》)。龚自珍为文常常信笔直书,有一种笃定的胸襟与气度,实非斤斤于结构与辞藻的桐城派古文可比。

除政论文外,龚自珍的记叙文也写得很有特色。他的记叙文可分为记人和记行两类。他的记人文章,常常以几个突出的事例,表现人物兀傲不群的个性。这类作品以《吴之癯》、《王仲瞿墓表铭》和《杭大宗逸事状》为代表。

乾隆癸未岁,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举御史,例试保和殿。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侍郎观保奏曰:是狂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上意解,赦归里。

大宗原疏留禁中,当日不发抄,又不自存集中,今世未见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孙之孙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余纸,鬻于京师市,有茧纸淡墨一纸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轲、齐宣王问答语,用己意,反复说之。此稿流落琉璃厂肆间。

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

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

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讲扬州安定书院,课诸生肆四《通》。杜氏《通典》、马氏《文献通考》、郑氏《通志》,世称“三通”。大宗加司马光《通鉴》云。

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内学士见之矣,世无知其善画者。龚自珍得其墨画十五叶。雍正乙卯岁,自杭州如福州纪程之所为也。叶系以诗,或纪程,纪月日琐语,语汗漫而瑰丽,画萧寥而粗辣,诗平澹而

中国散文通史·近代卷

屈强。同里后学龚自珍谨状。

同里张增南漪、王曾祥麟征，皆为杭大宗状。此第三状。详略互有出入。自记。（《杭大宗逸事状》）

《杭大宗逸事状》是龚自珍文章中最惊心动魄的一篇。作者似乎只是简单地罗列了杭大宗的几件“逸事”，且语调平淡，读者很容易一扫而过，然而在熟读几遍之后，文章背后的血痕就会渐渐隐现出来。杭大宗不屈的气节，以及乾隆皇帝的阴险与褊狭就会渐渐明晰。大宗以直言敢谏得罪了皇帝，故而“旨”交刑部，而一班廷臣震慑于皇帝的威严，对他的判决也是“部议拟死”。然而，此次殿试是为保举“御史”而设，“御史主言朝廷是非、百姓疾苦，及天下所不便事者也”（《干禄新书自序》），如果有人在考试中就因为直言敢谏而获死罪，就会有碍皇帝的英名。于是，在皇帝“博询廷臣”时，才有大臣体味上意，以“是狂生”为之开脱。“狂生”说的自然是疯话，所以皇帝不必再震怒于一个“狂生”的言辞。而皇帝也顺势“意解”，最后杭大宗被“赦归里”。然而，“归里”后的大宗似乎并没有什么感恩的心情，反而在乾隆皇帝南巡时，以“屈强”的姿态出现在皇帝的面前。而皇帝的一幅字“买卖破铜烂铁”，就等于为大宗下了永世不得翻身的圣旨。即使这样，大宗仍然再次要求出现在皇帝的面前，表露出永不服输的姿态。所以就有了“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鲁迅先生说的字缝里写的都是“吃人”，也许很适合用作此篇的评语吧。而同是被讥为“狂生”的作者，在写作《杭大宗逸事状》时的心情实在是值得玩味。龚自珍曾在《干禄新书自序》中提到自己：“龚自珍中礼部试，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乘轺车。”评者曰：“定公不善馆阁书，以是不能入翰林，乃作《干禄新书》以刺执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语人曰：‘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①作者无疑非常推崇杭大宗。他的胆识、学识、人格与才华，作者在文章中都作了不动声色的赞扬——“汗漫而瑰丽”、“萧寥而粗辣”、“平澹而屈强”。然而，这样的人才却生前死后一片寥

① 杨家骆主编《龚

类编》，台湾世界书局 1973 年版，第 22 页。